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四十九辑(2015年第3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体制障碍、增长潜力与可持续发展

褚敏 靳涛

市场化转轨、经济地理禀赋与城市经济绩效

高少慧 何一鸣 赖丹珠

惠农政策和农村收入不平等：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分析

吕玉霞 魏建 侯麟科

劳动力收入不足：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解释和测度

陈怡安

创新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严成禄 龚六堂

房地产税的制度基础研究

张青 严培胜 魏涛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四十九辑 (2015 年第 3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5 年. 第 3 期: 总第 49 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41 - 5903 - 5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 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090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于潇潇
责任校对: 王肖楠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李 鹏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四十九辑 (2015 年第 3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3 印张 250000 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903 - 5 定价: 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制度经济学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关于经济增长终因的争论	牛 贺 (1)
体制障碍、增长潜力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市场主导地位改革的新视角	褚 敏 靳 涛 (15)
市场化转轨、经济地理禀赋与城市经济绩效	
——来自广州的经验证据	高少慧 何一鸣 赖丹珠 (40)
惠农政策和农村收入不平等：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 分析	吕玉霞 魏 建 侯麟科 (58)
劳动力收入不足：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解释和测度	陈怡安 (71)
创新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严成樑 龚六堂 (99)
房地产税的制度基础研究	张 青 严培胜 魏 涛 (113)
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 实证研究	冯 华 辛成国 (132)
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生成机理及测度体系研究	
——来自银行业 16 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顾海峰 胡洁茹 (149)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宽容	李学迎 (172)
论语言的制度属性	刘 伟 高永峰 (187)
后记	(198)

CONTENTS

The Debate between Geography-hypothesis and Institutions-hypothesis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Niu He (14)
Institutional Barriers,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New Perspective of Market Leading	Chu Min Jin Tao (39)
Marketization Transition, Economic Geography Endowment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Guangzhou	Gao Shaohui He Yiming Lai Danzhu (57)
Pro-poor Policy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ce-in – Difference (DID)	Lu Yuxia Wei Jian Hou Linke (70)
Labor Insufficient Incom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Perspective and Measure	Chen Yian (97)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on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Yan Chengliang Gong Liutang (112)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Real Estate Taxation	Zhang Qing Yan Peisheng Wei Tao (131)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Factors' Impact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eng Hua Xin Chengguo (148)
Study on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Measurement System to Operation Risk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6 Listed Banks of Bank Industry	Gu Haifeng Hu Jieru (171)
Tole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ods Theory	Li Xueying (186)
On the Institutional Properties of Language	Liu Wei Gao Yongfeng (197)

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关于经济增长 终因的争论

► 牛 贺* ◀

【摘 要】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经济增长的差异来源于以上各要素积累的差异。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要素积累的差异？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终因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终因的研究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两大假说的争论过程，双方均会在各自研究中对对方研究加以回应。本文通过对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对两种假说之间的争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分析，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将争论焦点细化为若干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为长期经济增长终因的研究从“范式之争”向“问题之争”的转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济增长终因 制度假说 地理假说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在目前达到的共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然而，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些积累和进步的速率亟待回答，因此有了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近因（Proximate Cause）和终因（Ultimate Cause or Fundamental Cause）之分。近因即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终因的研究则是探寻是什么决定了诸多近因在各国的差异，即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deep determinants）。诺思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 1973）指出，创新、

* 牛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地址：（102488）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E-mail: 54019001@qq.com。

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本就是经济增长。诸要素的积累仅是经济增长的近因。

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终因方面，主要有两个假说较具代表性。一是地理假说（Geography-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地理因素是造成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这里的地理因素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经济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如经济体所处地区的经度、纬度、海拔、地形地貌及距海岸线距离等），又包括该地区气候状况以及一系列由气候条件所决定的地理条件，如是否利于农作物生长，是否多发疫病等。根据奥尔森（Olsson, 2005）的定义，地理因素指某一地区气候、地形、地质及生物地理的综合。二是制度假说（Institutions-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制度的质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因素。诺思（1981）对制度的定义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道德行为准则”。总的来说，制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使得对近因（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的投入增加，从而促成了长期经济增长。

地理假说并不排斥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假说也不否认地理因素的影响。两种假说都处在一个基本的大前提下，即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同时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正如罗德里克和萨布拉马尼安（Rodrik and Subramanian, 2003）对这个研究所做的描述一样，他们所要追求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简约化（parsimony）。罗德里克，萨布拉马尼安和特雷比斯（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s, 2002）认为，由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现象，用单个原因解释这一现象的想法是荒谬的，因此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将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来解释。然而，他们的工作正是要探究：如果把上述解释因素放在一起检验会得出什么结果，是要对这些解释因素在解释力、重要性等方面进行比较。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终因的研究与上述各假说之间的争论过程已融为一体，无论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研究地理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无法回避对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即需要对对方研究的结论做出必要回应，这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国内尽管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制度和地理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但基本上都是将两种因素分割开来各自研究，并未涉及对另一种假说的回应，这与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终因的“地理—制度”二元之争的研究态势有一定区别。本文通过对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对各假说之间、各假说内部的相同点以及不同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分析，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将争论焦点细化为若干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为长期经济增长终因的研究从“范式之争”向“问题之争”的转化提供参考。

本文认为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的主要分歧在于：制度是否对长期经济增

长具有排他性的解释力。而对这一焦点的争论又是围绕三个环节具体展开的。首先，制度和长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非仅是相关关系。即图 1 中③所示关系。这其中包括了能否排除反向因果性的问题，即排除图 1 中④所示关系的存在或证明其重要性远低于③所示关系：高制度质量带来长期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带来制度的改良。其次，地理因素对制度起何种作用，这种作用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作用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环节如图 1 中②所示。最后，地理因素是否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如图 1 中①所标示的关系，地理假说认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而制度假说则不然。地理假说认为地理因素通过一些直接途径（如通过生产率、人口增长、贸易及投资等）来影响经济增长，即图 1 中①所示路径；而制度假说认为地理因素只能经由间接途径（即通过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即图 1 中由②到③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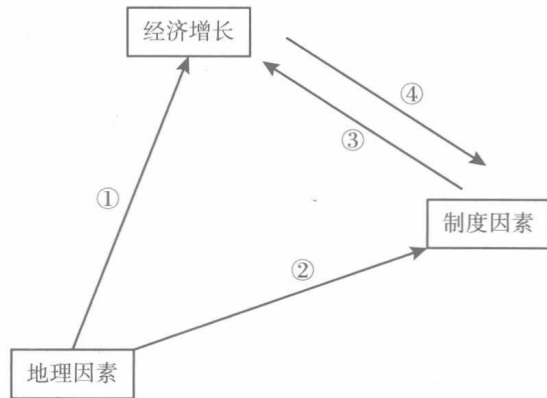


图 1 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性的争论

制度假说认为地理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例如，早期人们对于疟疾的原因不明，认为疟疾是有沼泽释放的瘴气诱发的，因为靠近沼泽的地方疟疾高发。但后来人们才发现，疟疾是由喜居于沼泽一带的蚊子诱发的。但是表面上却造成了沼泽和疟疾的某种相关性。地理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与上述例子类似，因为忽视了某种变量的存在而错把相关性当成了因果性。这种被忽视的变量便是制度（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3）。而他们的研究将不仅限于提供制度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而是更进一步地验证其因果性。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指出有两种方法可验证因果性，一是找到

与经济增长无关的引起经济制度差异的变量，即工具变量；二是自然实验。为此，他们提供了两个例证来说明其观点：一个是朝鲜和韩国的经济差异；另一个是殖民地财富逆转的现象。前者是单纯的自然实验，而后者既是自然实验，又包括了工具变量的使用。

朝鲜和韩国的自然实验是指，在拥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前提下，由于其制度的分野，从而形成了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差异（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朝鲜和韩国的现象孤例不证，制度假说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为此，他们又以更大的样本来研究殖民历史上出现的财富逆转现象。财富逆转现象是指，在公元 1500 年前后较富裕的国家成为了当今的贫困国家，而当时的贫困国家逐渐变得富有。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认为这种财富的逆转是源于制度逆转，即欧洲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殖民策略。为了避免反向因果性问题，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选取当时不同殖民地的居民死亡率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现在的贫富差距不大可能影响到当时的居民死亡率，但却有可能影响到现在的制度质量，即富裕造就了高制度质量。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到底是高制度质量带来富裕，还是富裕带来高制度质量的循环争论，所以引入工具变量。

随着技术的进步，地理因素对于人类的意义也将不同（魏特夫，1957）。然而在财富逆转的例证中，制度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地理因素没有改变，或者说，地理因素的变化并不影响财富逆转的过程。地理假说则认为：在财富逆转中，一定的地理因素也许对于 1500 年左右的经济发展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这被制度假说称为“复杂版本的地理假说”（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温带漂移假说”（temperate drift hypothesis）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温带逐渐取代热带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且温带地区的技术，尤其是农业技术，因为其特定的地域性，很难向热带地区传播。这些农业技术通常是在同一个“生态区域”内传播，而很难跨生态区域传播（Sachs, 2001）。由此，财富逆转可以被解释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热带地区在地理因素上的优势转化为劣势，且阻碍了来自温带地区技术的传播。对此，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指出这种理论并不具有说服力。首先，没有实证证据支撑。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的回归结果没有发现财富逆转和地理因素有联系（财富逆转是由制度逆转造成）。其次，时间不契合。欧洲农业技术在 16 到 18 世纪传向殖民地地区，而财富逆转发生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最后，工业技术而非农业技术才是财富逆转的基础。财富逆转是与工业化密切联系

的。对此，地理假说认为一定的地理因素是有利于工业化进程的，这一点也不被制度假说所认同。首先，地理假说认为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深化了分工。如果一国运输成本过高，阻碍了其贸易，那么工业化过程也将受阻。制度假说再次指出这种联系得不到实证结果的支撑，并且举出若干拥有天然良港却未实现工业化的地区的例子，如中美洲，印度尼西亚等。其次，地理假说认为特定的自然禀赋对于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如煤炭资源。萨克斯（Sachs，2001）指出，煤炭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时世界各国还无法依靠远洋运输来弥补国内资源禀赋不足的问题，因此温带地区由于其煤炭储量取得了资源上的优势。尽管石油逐渐取代煤炭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资源，但煤炭储量使得工业化国家获得了一定的起步优势。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则指出，煤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资源之一，在 100 个国家均有探明储量。由此，制度假说认为，以地理因素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说法不能作为解释财富逆转的原因。或者说地理因素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财富逆转，制度的改变是主因。

如果说“技术进步改变了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的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一旦制度假说可以证明制度是决定技术进步的根本因素，制度假说将强有力地证明制度的基础地位。同时，制度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是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一环。制度假说认为，由于包容性制度为技术发明和传播提供了动力，从而促成了长期经济增长。在技术发明方面，产权保护使得技术发明者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保障，是他们更有动力从事发明活动，而企业家也有了动力去投资技术研发；在技术传播方面，因为同样的原因，推广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

制度质量的高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一是：产权保护为发明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激励，更重要的是，这一激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发明活动。诚然，发明者的劳动成果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否这一保障促进了发明行为的激增呢？戴蒙德（Diamond，1997）指出，从一项技术发明出现到实现商业化而大量普及，对该技术的改进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的渐进过程。最初的发明往往十分“笨拙”，其确切用途也难以确知。此外，就算该技术达到了应用阶段，最初的实际应用往往成本高昂，多是富人出于猎奇心首先使用。也就是说，技术的基础来源往往与商业利益相距甚远。此外，创新的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也是未知和不可预测的。一项发明被创造之初，发明者本身并不能准确预知其未来的应用前景。

戴蒙德（Diamond，1997）和萨克斯（Sachs，2013）认为，技术的传播和接受在技术进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更重于发明。阿西莫格鲁和戴蒙德都认为既得利益者在传播中起到了阻碍作用，但不同的是，后者认为阻碍技术推广的主要因素是地理方面的。例如，作为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发明，

轮子在墨西哥长期是一种玩具，并未用于生产，其原因是墨西哥不存在适合被驯养以拉车的牲畜。萨克斯（Sachs，2013）则强调了成功地引进技术不仅需要考虑制度因素，还要看引进的成本。如果一经济体所在地区气候条件恶劣，远离主要市场，远离海港，则因为成本问题，国外技术难以通过投资或外包引进。如越南和玻利维亚，后者尽管在制度上符合制度假说所倾向的标准，但由于玻利维亚地处内陆，多山且高海拔，增加了其承接技术转移的成本；而越南因为其海岸线较长，多海港，承接技术转移的成本较低。

三、关于地理因素对制度影响的争论

地理假说和制度及假说都承认地理因素对制度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二者对该影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给予了不同地位。前者认为这种影响具有普遍性，而后者则不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3）指出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无直接影响，而且其经由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也不是一种普遍效应（universal effect）。地理因素经由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欧洲殖民）。制度假说认为地理因素必须经由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换言之，如若地理因素不是对制度产生了影响，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无从谈起。

对于热带地区普遍的贫困，制度假说将之归因于这些地区的制度质量普遍较低，而制度的差异来源于欧洲各国对各地殖民策略的不同。地理因素的影响是：各殖民地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宜居程度（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一方面，在适于欧洲殖民者定居的北美、澳洲等地，由于欧洲居民数量较众，这里引入了欧洲的产权保护制度。另一方面，在不适宜定居的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殖民者设置了专为攫取资源而服务的制度。对两种不同制度的选择是基于该地区当时的生存环境，即在宜居地定居，而在不宜居地攫取资源。由于制度具有较高程度路径依赖，两种不同的制度各自发展，并造成了其后的贫富差距。研究表明，在引入制度因素作为变量后，地理因素失去了其显著性。阿西莫格鲁等学者认为，这表明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只有间接影响，即它只能经由对制度的影响才能发挥作用。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索科洛夫和恩格尔曼（Sokoloff and Engerman, 1997; 2000），他们认为，拉丁美洲由于其地理条件适于种植业的发展，导致了庄园的大量出现以及对奴隶的巨大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的制度。由于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霍尔和琼斯（Hall and Jones, 1999）认为受西欧在制度方面影响较大的地区呈

现了更快增长。他们选取语言作为欧洲影响的指数，选取纬度间接反映欧洲影响的不同程度。之所以可以用纬度来反映，是因为当时欧洲居民倾向于选择人口密度小以及气候条件接近欧洲大陆的地区，而当时纬度越高的地区，越符合上述条件。既然制度不一定是由地理因素塑造的，那么更一般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制度的形成？由前述可知，制度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差异决定于经济制度差异，而经济制度内生地决定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权力决定了当期的经济制度和未来的政治制度，而其自身又决定于当期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由此，地理因素并不是一般的决定制度形成的原因。此外，罗德里克，萨布拉马尼安和特雷比斯（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s, 2002）认为用地理来解释制度的理论会低估政策对制度的影响。罗德里克等学者认为应把制度看作存量，而把政策看为流量，现有制度是过去政策累积的结果。地理因素无法解释在过去三十年制度的快速变化，因为这个时间段相对较短，地理因素没有根本性变化。

与制度假说不同，地理假说认为制度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当今的制度是以往制度的延续，最初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而农业是高度依赖于地理因素的生产方式，因此地理环境是差异的来源。另外，布劳特（2002）认为，资本主义的原型在各大洲同时出现，欧洲因其地理位置（靠近美洲），使得其在美洲获得了大量财富，助其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其他大陆的原型资本主义相对或绝对地衰落了。制度假说则强调了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区别，并认为尽管地理条件对农业技术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制度因素成为决定性因素（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3）。

四、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是否有直接影响

对于地理因素之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的争论大致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殖民时期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地理假说主要研究地理因素如何塑造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牧定居的转变，而制度假说则强调了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均是经由制度（产权）的改变对生产力水平起到了激励作用。在第二阶段，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对于财富逆转（Fortune Reversal）的现象有着不同解读。制度假说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证明地理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无直接影响，地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经由制度发挥作用的。而地理假说对制度假说的实证研究提出质疑。

人类在新石器革命时期长期处于两种生产方式的选择中，即狩猎采集和

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长期共存，直至后者几乎完全替代前者，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地理假说认为地理因素起了主要作用：首先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大量物种在更新世（Pleistocene）末期灭绝，至于原因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杀戮尚有争论。其次，更新世末期的气候变化有利于某些可驯化植物，这些植物正是农业作物的前身。例如，新月地带的野生谷物具有谷粒大，成熟时间短等特性，为后来的驯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上述因素导致了农业人口获得了食物生产上的优势，进而，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伙拥有比狩猎群伙更多的人口，且在工具和技术上较为先进。食物生产的剩余使得农业生产的群伙可供养职业士兵和工匠，在军事上优于狩猎人口（Diamond, 1997）。

制度假说认为在从狩猎到农牧的转变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诺思，1981）。首先，公有产权较专一公有产权，加快了资源的消耗速度，最终导致动植物资源出现稀缺（在这里，诺思支持史前人类人口静态的假定，即人口水平低于可伤害资源基础的水平）。诺思认为由于群伙规模较小，群伙内约束力强，因而专一公有产权取得了近似私有产权的效果，可以构成对资源利用行为的约束。其次，对于布雷德伍德在1963年提出的中心区理论，即有较多可驯化动植物导致向农牧业转变，诺思（North, 1981）认为这只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动植物的驯化行为受到了专属产权的激励是促成转变的关键。史前人类先发明了对丰饶野生谷物的产权，而后专属产权刺激了新知识的获取行为。尽管驯化行为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在专属产权下，驯化所得报偿会鼓励‘错了再试’的选种和动物选择过程。”

从狩猎到农牧的转变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也由迁徙变为定居，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均强调了定居的重要意义，但地理假说认为定居的重要意义在于定居的生活方式缩短了出生间隔，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在迁徙状态下，一个家庭只有在最小的后代可以独立应对迁徙（如长途行走、奔跑）时，才有可能继续抚养下一个后代（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定居的生活方式缩短了出生间隔，使得人口大量增加（Diamond, 1997）。而制度假说强调了定居在产权方面的意义，即定居使得专属产权固定下来，从而激励了新知识的试错行为（North, 1981）。按照制度假说的说法，群伙先对一块丰饶的野生谷物确立专属产权，进而有了对这一片区域进行生产改善的动力。

除了新石器革命时期，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的争论还集中在欧洲殖民时期的经济事实上，制度假说对原殖民地财富逆转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地理因素和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关系（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s, 2002；Easterly and Levine, 2002）。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的研究表明，在引入制度变量后，地理因素失去了其显著性。

阿西莫格鲁等学者认为,这表明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只有间接影响,即它只能经由对制度的影响才能发挥作用。由此他们得出结论,相比于制度因素,地理因素至多只对经济增长起到间接的作用。对于制度假说所得出来的一系列实证结果,地理假说的支持者并不赞同,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质疑。

第一,地理假说认为地理条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地理条件不仅影响了经济中的投入(资源禀赋),而且影响了经济的生产函数,影响了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Easterly and Levine, 2003)。麦克阿瑟(McArthur)和萨克斯(2001)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地理因素的力量足以直接影响社会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直接影响生产函数或生产关系?如果疫病的流行足以造成一个高的居民死亡率,那它又怎么能够不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萨克斯(Sachs, 2003b)指出,制度假说所认为的造成制度选择差异的地理因素(包括欧洲移民的居住环境、生存风险,当地农业产量,运输成本等),正是建立在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的基础上的(地理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制度假说在图1中所指示的由②到③的路径,有可能是通过由①到④的路径发挥作用的。

第二,选取什么代理变量来指示地理因素。由前述地理因素的定义可知,地理条件是一个由气候、地形、地质、生物群落多方面有机结合的整体。将这些因素割裂开来,以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地理因素的综合影响进行衡量,有可能造成结果的偏差。即使是对这些因素的单独衡量,有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萨克斯(Sachs, 2003a)指出,罗德里克,萨布拉马尼安和特雷比斯(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s, 2002)单纯地用距赤道距离来代表所有的地理因素,而纬度这一指标只是对地理因素的一个很简陋的测度。所以他认为,单纯以纬度代表所有地理因素而得出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无直接影响的结论有失偏颇。萨克斯(Sachs, 2003a)以疟疾指数(Malaria-index)作为代表地理因素的变量加以研究,在控制了制度变量后,地理因素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依然存在。事实上,在地理假说自己的研究里,也对地理因素的代理变量作了区分,在引入了疟疾指数后,代表是否处在热带地区的变量失去了显著性(Gallup and Sachs, 1999)。关于疟疾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认为,疟疾对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该地区大多数成年人已具备一定的免疫能力。对此,兰德斯(Lands, 1998)曾指出:“现代医学可以保证婴儿存活、人类长寿,但不能保证他们身体健康。”疾病会影响人的劳动能力。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 1999)发现,对疟疾有免疫力的成年人大多因为其患有诸如海洋性贫血(Thalassemia)一类的血液病,这些血液病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力的质量。除了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影响,疫病的影响还体现在防治成本以及其对投资、旅游等造成的损失。疾病防治开支巨大,这对本就贫困的

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Lands, 1998)。萨克斯 (Sachs, 2003b) 认为阿西莫格鲁, 约翰逊和罗宾逊忽视了一个事实, 那便是疟疾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外国投资, 增加了国际贸易、移民以及旅游的相关成本。他指出这就如同当衡量非典型性肺炎对香港地区的冲击时, 绝不能只以其造成死亡人数来衡量, 因为非典型性肺炎还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旅游、国际贸易等产生了严重冲击。从衡量地理因素影响的角度, 疟疾指数确实优于之前的距赤道距离, 原因是无论是温度、海拔、距赤道距离, 都是非生物地理因素, 而生物地理因素 (疟疾) 更加综合地体现了其他非生物地理因素的影响, 因为只有在一一定的气候、地形和地质条件下, 才会形成特定的生物群落。地理条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诸多地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 选取衡量地理条件的指标也应该体现这种综合影响。奥尔森和希布斯 (Olsson and Hibbs, 2005) 选取了生物地理因素作为衡量地理因素的指标, 即可驯化植物和动物的数量, 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制度变量后, 地理变量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仍然是显著的。由此, 奥尔森和希布斯得出地理因素并不是必须经由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第三, 制度因素的工具变量是否被恰当地引入。工具变量的引入被认为造成了对其替代变量 (制度) 影响力的高估,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远没有实证结果所显示得那么大。同时, 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实际上都是一些地理因素, 如霍尔和琼斯 (Hall and Jones, 1999) 选用了纬度, 而阿西莫格鲁, 约翰逊和罗宾逊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以及罗德里克, 萨布拉马尼安和特雷比斯 (Rodrik, Subramanian and Trebbis, 2002) 则选用了疫病的流程度 (居民死亡率)。这些都使得上述研究很有可能错把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错误地理解为了制度因素的影响 (Hemmer, 2005)。

五、结 论

地理和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融合双方观点的关键一环。在制度假说的研究框架内, 资源占有的对比变化成为制度演化的来源, 而资源占有的对比既可以是当期经济制度和前一期政治制度约束的结果, 也可以受外来冲击的影响。例如, 西方金银涌入欧洲, 改变了社会各阶层实力配比, 从而使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增长”的循环进入一个新的模式。但是这种外来冲击一定是源于地理因素吗? 这一问题是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整个争论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制度假说已经承认地理因素经由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只不过他们强调必须经由制度), 一旦地理因素对制度影响的普遍性及其作用途径获得普遍的共识, 那么整个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的争论将

变为一个统一的由“地理—制度—经济增长”组成的研究框架。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将不再是终因之争，而是因果链上的远因和近因之分，这样的划分似乎更为合理。而对于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直接影响的问题，本文经过对双方争论的分析后发现，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了对地理因素指示变量的进一步改进，即在实证研究中，到底什么样的可操作变量更能体现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复杂的综合的影响。随着计量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地理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会得到更好的解决，进而对地理假说和制度假说的争论提供更丰富可靠的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美]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中信出版社 2008 年版。
2. [美] 道格纳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3. [美] 道格纳斯·C·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
4.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5. [美] 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6. [美] 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7.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
8.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December), pp. 1369 - 1401.
9.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Vol. 107 (4, Nov), pp. 1231 - 1294.
10.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3, "Understanding Prosperity and Poverty: Geography, Institutions and the Reversal of Fortune," *Understanding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3,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